

# 中國大陸學界十年來關於《經世文編》的文獻回溯（2012-2023）

## Respective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Jingshi wenbian*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

黃麟凱（Huang Linkai）、雷中行（Lei Zhongxing）\*

### 一、前言

《經世文編》系列發端於明末，勃興於清季，消亡於民初，收錄明清兩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的一手文獻。該巨著反映明末及晚清之際國家面臨的諸多困境，彙集時人對社會問題的看法和思考，為研究明清兩代歷史尤其是近代社會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關於《經世文編》的研究，早期偏重於「人物與思想」層面，21世紀初其取向出現兩種方向轉移：一為討論《經世文編》的編纂問題；二為探究《經世文編》現象，以及其與近代新式出版品的關係。<sup>1</sup>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中國大陸學界有關《經世文編》的學位論文、學術論文層出不窮，相應的研究方向也與早期學者旨趣大異。本文概述了大陸十餘年來《經世文編》的研究趨勢和成果，希冀能夠對未來的研究有所借鑒和啟示。

### 二、《經世文編》編纂問題研究

這十年來關於編纂問題的研究，是對早期學者的繼承和發展。韓承樞將早期學者研究歸納為文編與社會、<sup>2</sup>編纂群體、編纂體例三個方向，<sup>3</sup>除此之外，早期學者對選文原則也多有論述。<sup>4</sup>在此基礎上，晚近學者開始深入文本，關注具體的文獻編輯方法及原則問題。下面將晚近學者研究分為文編與社會、編纂群體、選文原則、編纂體例、文獻編輯五個方面予以介紹。

#### （一）文編與社會

《經世文編》寄託著編者的經世理念，其編纂有著獨特的歷史背景和人文環境。前人結合選文內容，論述《經世文編》與社會變動的切合性。近人傾向於從因果角度，探討社會文化背景對《皇明經世文編》或《皇朝

\* 作者黃麟凱現為華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雷中行現為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講師。本文為中國大陸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專案晚清物理學文獻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之一；亦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專案清代格物致知學術體系的分化與近代物理學科的形成與嬗變研究階段性成果之一。

1 韓承樞，〈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史原》復刊2期（2011.9）：205-238。

2 本文在時間上承接韓承樞〈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文中早期學者研究是指2002年至2011年的相關研究。

3 韓承樞，〈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頁220。

4 楊純瑛，「《明經世文編》編纂問題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2）。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

《經世文編》編纂的影響。

虞萬里從經世與實學、社團與選文、結黨與務實三個方面，論述了《皇明經世文編》的編纂背景。<sup>5</sup> 通過梳理明代以來類似於《經世編》的文獻，虞氏認為正德、嘉靖以後，此類文獻的編纂已成為士大夫拯救明王朝的普遍措施。在這種學術傳統的影響下，陳子龍等人萌生了編纂明代「資治通鑒」之意，後經張溥啟發與方岳貢授意，先行編纂《皇明經世文編》，以為「皇明資治通鑒」做資料準備。同樣，程彬也從編纂背景角度探討了該書的成因。<sup>6</sup> 程氏首先分析了松江府的地理位置，指出附近的圖書市場為《皇明經世文編》的短時間成書提供了必要條件，其後論述了陳子龍等人編纂該書的動機，認為其成書主要是受到學風、時局及政治的影響。宋瑤簡單介紹了《皇朝經世文編》成書的社會背景和學術背景，認為清末社會危機和宋學、今文經學兩大學派的復興，促使該書應運而生。<sup>7</sup>

## （二）編纂群體

《經世文編》系列共收錄文章1萬5千餘篇，約3千萬字，如此卷帙浩繁之作，其背後有著龐大的編纂群體。早期學者通過分析文獻的方法，梳理了編纂群體的分工、身分及目的。晚近學者在此基礎上，對《皇明經世文編》與《皇朝經世文編》的編纂群體進行進一步考證，且在研究方向上出現了向載文作者群體過渡的傾向。

虞萬里將《皇明經世文編》的編纂群體分為主編、選輯、參閱、鑒定四個部分，針對各部分人員的職責及相互配合，運用大量史料進行探討。首先，通過分析《皇明經世文編》序言、卷首及時人相關文章，虞氏推測，在三位主編人員中，陳子龍起到最為主要的作用；主編

與選輯者共同列在卷首的格式，反映了一種甄選文章的程式，即選輯者初選、主編複選。其次，根據《明史》及明代天啟以後的文獻，虞氏認為，「參閱」是參與校閱之意，為避明熹宗朱由校之諱，故改校閱為參閱。最後，在戴文和著作的基礎上，虞氏對鑒定名公群進行了進一步查考和分析，從而確定鑒定名公群實際上是進士官僚群。廣攬進士列為鑒定名公，一方面是為使該書得到最大限度的傳播，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為使主編、選輯者和參閱者之名流傳於名公大臣之間，從而為日後求得進身之階。<sup>8</sup> 同樣，程彬也對《皇明經世文編》編纂群體的構成和作用進行了分類討論。程氏將編纂群體分為選評人員、<sup>9</sup> 參閱群體、鑒定群體三個部分，通過對文獻的對比分析，程氏指出，在評議人員中，除陳子龍外，徐孚遠和徐光啟也有直接或間接參與；戴文和對參閱人員的考訂，仍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鑒定名公姓氏」成員在成書過程中起到了提供金錢、給予取捨裁剪建議或參與選輯和參閱的作用等。<sup>10</sup>

除了對《皇明經世文編》編纂群體的分類研究之外，近年來也有個案研究出現。例如，陳豪傑、森正夫均以陳子龍為研究對象，詳細梳理了其人生軌跡和學術活動，<sup>11</sup> 使我們對陳子龍及其所處時代有了較為全面的瞭解。但是森正夫的研究主要針對陳子龍關於江南地區的文章及其特點，脫離了《皇明經世文編》的範圍；陳豪傑雖然論述了陳子龍編輯《皇明經世文編》的原則及思想，但並未深入挖掘其人生經歷對編輯思想所造成的影響。

關於《皇朝經世文編》編纂群體，學界普遍認為，江西布政使賀長齡延請魏源入幕，代其編纂《皇朝經世文編》，即該書名義上由賀長齡主持，實際上由魏源編

5 虞萬里，〈《明經世文編》之編纂及其價值〉，《經學文獻研究集刊》18（2017.9）：166-227。

6 程彬，「《明經世文編》編纂研究」（開封：河南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17）。

7 宋瑤，「關於《皇朝經世文編》編纂的研究」（曲阜：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12）。

8 虞萬里，〈《明經世文編》之編纂及其價值〉，頁173-187。

9 選評人員包括選輯群體和評議人員。

10 程彬，「《明經世文編》編纂研究」，頁13-24。

11 陳豪傑，「陳子龍編輯思想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編輯出版學碩士論文，2004）。森正夫，〈陳子龍的江南論〉，《明史研究》13（2013.6）：103-121。

纂。<sup>12</sup>近年來有學者注意到賀長齡在成書過程中的作用。例如，宋瑤分析了魏源、賀長齡各自的人生經歷及其對編纂工作的影響，認為賀長齡作為主持者，不但以其經世思想引導著編纂的方向，而且為編纂工作提供了物力財力支援。<sup>13</sup>除了編纂群體之外，也有學者對載文作者群體或個別載文作者進行了研究。徐春曉通過解讀《皇朝經世文編》選文的治國理念和價值取向，著重從黜虛重實、興利除弊、明辨公私、鄙薄西學四個方面闡述了載文作者群體的歷史思想，同時指出由於編纂者維護朝廷權威的立場，所選之文局限於為封建統治辯護，無法從中釐清載文作者的全部思想。<sup>14</sup>張群、楊子月引用《姚端恪公全集》、《清史稿》等文獻，從價值傾向、律學修養、律學觀念三個方面論述了《皇朝經世文編》中法律文章最多的作者—姚文然在律學方面的成就和觀點。<sup>15</sup>

部分學者對饒玉成編纂的《皇朝經世文續編》的載文作者進行研究。王澧華根據該書收錄的李元度為饒氏所作的壽序、集序，以及《椒生詩草》、《國朝柔遠記》中李氏所做的詩序、文序，結合其他相關文獻，考證了李元度罷官家居後的人際交遊、暮年起復前的抗法海防經歷，並進一步論述了其經世思想在中法戰爭前後的演變。<sup>16</sup>

### （三）選文原則

《經世文編》系列上自朝廷詔書、名臣奏議，下至私人著述、報刊議論，皆有所收錄。從浩如煙海的資料中篩選所謂經世之文，必然要有相應的選文原則。早期學者根據序言、凡例及選文的內容與作者等，詳細闡述《皇朝經世文編》的選文原則。晚近學者在繼續早期學

者研究的同時，通過分析卷首的《五例》、《姓名總目》等，對《皇朝經世文編》的選文原則也有所討論。

1962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皇朝經世文編》，吳晗在序文中將選文原則概括為明治亂、存異同、詳軍事。今人對此多有補充。虞萬里依據宋征璧撰寫的《凡例》，論述了《皇朝經世文編》文獻搜集的途徑，並進一步歸納了選文的主要範圍，包括內閣政要機務、冢宰百官銓選、將帥軍政部伍、邊防海防方略、撫民安內策略、朝廷禮儀禮樂、財政賦稅屯墾、司法刑罰治安、營造水利工匠、馬政十個方面。<sup>17</sup>程彬分析、統計了《皇朝經世文編》所收文章的內容及作者，提出其選文特點是以事為主，以人為輔。<sup>18</sup>岳淑珍通過對《凡例》與選文作者的分析，將《皇朝經世文編》的編選原則概括為徵實、詳備。<sup>19</sup>關於《皇朝經世文編》，宋瑤、崔慧紅對該書「審取」、「廣存」的選文原則都有所論述，<sup>20</sup>在此基礎上，宋氏根據其卷首《皇朝經世文編姓名總目》，討論了資料來源的主要途徑、地域性傾向。<sup>21</sup>

### （四）編纂體例

作為一種編纂形式，《經世文編》系列以「經世」為名，將各種切於實用之文分門別類彙集成書，其體例結構在經世思想的指導下，也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逐漸有所調整。早期學者往往從長時間段角度，審視《經世文編》系列的體例沿革及其對應的知識結構變化。晚近學者對編纂體例的研究，大多針對單一文本，且主要關注其背後的編纂思想。

虞萬里參照其他明代文獻彙編的體例，結合《皇朝經世文編》的選文特點，討論了該書按作者年代順序編

12 徐松巍，〈匯治國良策 開經世新風——《皇朝經世文編》〉，《文史知識》1998.6: 54-57。

13 宋瑤，「關於《皇朝經世文編》編纂的研究」，頁4-6。

14 徐春曉，〈論《皇朝經世文編》載文作者的歷史思想〉，《黑龍江史志》15（2014）: 376-377。

15 張群，楊子月，〈《皇朝經世文編》中的法學名家——清初刑部尚書姚文然的律學貢獻〉，《社會科學論壇》2020.6: 129-140。

16 王澧華，〈李元度集外佚文四篇輯述〉，《湘學研究》2020.2: 118-169。

17 虞萬里，〈《明經世文編》之編纂及其價值〉，頁188-191。

18 程彬，「《明經世文編》編纂研究」，頁26-31。

19 岳淑珍，〈《皇朝經世文編》編輯思想淺論〉，《中國出版》16（2012）: 42-45。

20 崔慧紅，〈魏源《皇朝經世文編》與圖書編撰思想〉，《河南圖書館學刊》33: 10（2013）: 139-140。

21 宋瑤，「關於《皇朝經世文編》編纂的研究」，頁8-10。

排的原因，<sup>22</sup>並總結了其文體排序的規律，即「敕、封事、贊、頌、銘等與皇上有關者在最前，而後是疏、議、公移、文移、書、揭帖、序（敘）、記、題後、碑、雜記（或雜著、雜論、雜說）等，如一種文體僅一篇，而其他有數篇，遂有將一篇置於最末。」<sup>23</sup>趙安妮論述了《切問齋文鈔》在編纂體例上的變化，認為以事分類「能夠最大程度地突出這些文章的經世效應」。<sup>24</sup>宋瑤根據《皇朝經世文編五例》，闡釋了《皇朝經世文編》的編纂形式及綱目內容，並進一步討論了該書體例對《皇明經世文編》、《切問齋文鈔》的繼承與發展。<sup>25</sup>同樣，崔慧紅也介紹了《皇朝經世文編》的綱目體系，指出輔文起到了完善該書體例結構的作用。<sup>26</sup>

與上述對單一文本的研究不同，周積明在梳理《經世文編》流源演變的基礎上，對《皇朝文鑒》、《皇明經世文編》、《切問齋文鈔》、《皇朝經世文編》的體例進行了分析對比，認為陸耀在《切問齋文鈔》中以「學術」統領全篇「實本於理學經世的理念」，《皇朝經世文編》的體例編排，實則蘊含了「內聖、外王兼具的經世意識。」<sup>27</sup>

### （五）文獻編輯

在編纂《經世文編》的過程中，編者會採用修改標題、增刪內容、圈點評注等方法，對選文中某些無益於經世的內容進行加工處理。早期學者對文獻編輯的方法及原則論述較少，晚近學者對相關問題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於《皇明經世文編》和《皇朝經世文編》。

虞萬里運用史料梳理了圈點評注的源流，提出《皇明經世文編》中的圈點評注是主編、選輯、參閱、部

分鑒定群體共同所為，並將其歸納為圈點文句、評述文句、既圈且評三種形式。<sup>28</sup>程彬對《皇明經世文編》中的選文裁剪、圈點評注皆有所討論。程氏首先將該書所收文章與其存世明刻本進行對比，總結出選文裁剪的兩種方式：一是刪繁就簡，實用為主，即選文刪除了序、書、碑記、奏議等體裁中的虛文與官方用語，以及奏議類文章中重複或不合標準的內容；二是增加旁題，明確主旨，即選文或採納文集擬定的題目，或採納奏議本身的題目，並增加旁題以區分題目重複的文章。接著重點分析了評注文字，將其按內容分為兩類：一是對選文文辭、作者、內容的評價；二是對選文來源的介紹及內容的解釋。最後通過論述軍政、治安、吏治方面的圈點評注，探討了其中包含的政見。<sup>29</sup>

宋瑤對《皇朝經世文編》選文內容如何取捨、其取捨是否合理等問題，進行了重點研究。通過按綱目比重抽取文章與原文對照，宋氏發現選文大多經過加工處理，具體包括以下方面：1. 修改標題。即編者以樸實、準確、簡明等為標準，修改原文標題，以便讀者檢閱；2. 拼合。即為切於實用，很多選文由同一篇文章的幾個段落或不同文章拼合而成；3. 添加。即添加連接詞，使拼合文章的銜接處連貫，或添加後記，記錄前人舊文現在的使用情況；4. 改詞句。使思想、表述更加清晰明確；5. 刪削。即刪削例語、措辭用語、重複或與主旨無關的內容，增強實用性；6. 簡練。即精簡原文中舉例、說明性文字，使內容言簡意賅；7. 加句讀圈識。便於讀者閱讀。宋氏指出，上述處理方法雖能有效發揮編纂目的，但選文存在銜接處生硬、刪削不當等問題，且由於缺少標注說明，修改後的文章脫離原文，不便使用。<sup>30</sup>

22 虞萬里認為其原因有三點：首先，文章不易分類，且編輯時日短暫；其次，文獻無法在一定時間內搜羅到完善狀態；最後，編者或許有意與前賢不同。

23 虞萬里，〈《明經世文編》之編纂及其價值〉，頁 191-194。

24 趙安妮，「包世臣經世散文研究」（蘭州：蘭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21）。

25 宋瑤，「關於《皇朝經世文編》編纂的研究」，頁 7-12。

26 即正文之外的序言、凡例、目錄、作者介紹、注釋等。崔慧紅，〈魏源《皇朝經世文編》與圖書編撰思想〉，頁 140。

27 周積明，〈《皇朝經世文編》「刑政」門中的法律文獻〉，《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2012.5: 338-374。

28 虞萬里，〈《明經世文編》之編纂及其價值〉，頁 216-221。

29 程彬，「《明經世文編》編纂研究」，頁 31-57。

30 宋瑤，「關於《皇朝經世文編》編纂的研究」，頁 8-10。

整體而言，這十年來有關編纂問題的研究，在論文數量上與早期學者研究大體相當，<sup>31</sup>但是雙方在研究對象及方向上都有所差別。首先，在研究對象上，早期學者或考察單一文本，或從長時間段角度審視《經世文編》系列，晚近學者則以針對《皇明經世文編》或《皇朝經世文編》的單一文本研究為主。其次，在研究方向上，早期學者關注的課題以編纂群體和編纂手法為中心，晚近學者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和擴展，一方面深入文本，研究選文內容的變化及編輯的方法、原則，另一方面注意到《經世文編》的文獻價值，開始關注載文作者群體。韓承樺指出，由於拉長時間並擴大目標，早期學者的許多研究只能作出概述性的論述。<sup>32</sup>筆者認為，近年來有關編纂問題的研究呈現細化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上述不足之處。

### 三、《經世文編》文化現象研究

這十年來關於文化現象的研究，以對《經世文編》的史料運用為主。韓承樺將早期學者研究歸納為現象探究與史料價值評估、文編與近代新式出版品兩個方向，<sup>33</sup>在早期學者相關評述的基礎上，近年來將《經世文編》作為基礎史料或以經世文編為題的專門史研究開始大量湧現。下面將晚近學者研究分為文化現象成因、史料價值、文編與其他出版物三個方面予以介紹。

#### （一）文化現象成因

《經世文編》系列前後相承，多達二十餘部，其續編之熱潮，被譽為清末民初六大世風之一。<sup>34</sup>關於此文

化現象的成因，早期學者對其外在與內在的影響因素皆有所論述，<sup>35</sup>晚近學者側重於從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方面進行探討。

王靜從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儒家經世致用路徑在晚明時期的分野，認為陽明心學的崛起和邊疆沿海的現實危機，導致經世致用思想在明末應時而變，分化出史學經世和科技經世兩種發展理路，其中以陳子龍《皇明經世文編》為代表的經世文編高潮的出現，正是晚明儒士在史學經世路徑上有所開拓的突出表現。<sup>36</sup>單曉娜、涂耀威對《大學》模式的意蘊及其與晚清經世之學的關係進行探討，認為《大學》模式是經世的基本原則與指導思想，其在晚清的高揚，反映了「儒家思想對傳統中國社會精英及大眾行為和思維方式的影響」。而晚清《經世文編》系列文本的出現，格致之學的興起，都與《大學》模式有所關聯。<sup>37</sup>劉永祥、李鑫著重分析《皇朝經世文編》出現在嘉道時期的成因，認為此書問世屬於經世派士人對乾嘉考據學風的挑戰。甲午戰敗說明清朝邊疆治理重陸不重海的傾向已威脅到統治階級，故魏源以實學為尚，打破漢宋之爭，重塑編纂體例以求經世致用，這不僅兼采眾家之長，亦為向西方學習打開一條路徑。<sup>38</sup>

#### （二）史料價值

關於《經世文編》的史料價值，早期學者已在專門史研究方面對其有所評述，並著重強調從整體、長時間角度審視《經世文編》的研究方法。<sup>39</sup>晚近學者對單一文本和晚清《經世文編》系列的史料價值都有所討論和利用，其中單一文本的研究對象以《皇明經世文編》和《皇朝經世文編》為主。

31 韓承樺在〈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中列舉的有關編纂問題的論文為14篇，筆者所見近十年來的相關論文為13篇。

32 韓承樺，〈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頁230。

33 同上，頁221。

34 張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740。

35 韓承樺，〈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頁224。

36 王靜，〈晚明儒家經世致用路徑的分野〉，《人文天下》22（2019）：27-30。

37 單曉娜、涂耀威，〈「大學模式」與晚清經世之學〉，《求索》2011.11：245-247。

38 劉永祥、李鑫，〈《皇朝經世文編》與道嘉時期經世思潮的勃興〉，《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44（2022）：171-172。

39 韓承樺，〈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頁229。

## 1. 皇明經世文編

作為「經世文編」體的發端，《皇明經世文編》記載了有明一代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具體情況及典章制度，為研究明代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與興亡軌跡。<sup>40</sup>近年來中國大陸學界圍繞該書，對明代時政及士人相關思想主張進行了大量專門史研究。

在軍事方面，徐向南通過對《皇明經世文編》中涉及遼東女真之事的文章進行專門性研究，揭示了該書在研究明代遼東局勢方面的文獻價值。在整理相關篇目的基礎上，徐氏首先介紹了《皇明經世文編》中遼事類文章的選輯背景與概況，其次以是否在遼東任職為依據，分析文章作者的撰述情況，認為「在遼東任過職或到過遼東的作者所持觀點和所著文章，更加貼近現實、貼近具體問題」。最後分邊防概況、備邊作戰、後勤保障、整飭吏治四個方面，介紹遼事類文章的主要內容，進而對其在研究明代遼東歷史及明朝與女真關係方面的史料價值進行總結。<sup>41</sup>同樣，王慧明也將《皇明經世文編》作為研究明代軍政的第一手史料，通過對明代官修史書、官員奏議及《皇明經世文編》等史料中的相關文獻進行整理分析，以募兵制下國家與個人、社會的關係為線索，考察了明代募兵制的發生、管理、軍餉結構、軍事成效，並進一步論述了其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及對軍事、財政的影響。<sup>42</sup>此外，朱若翌立足於明末士人文集，探討總結了晚明士人對日本和王辰戰爭的認知特點。在此過程中，朱氏分析了《皇明經世文編》編纂群體處理東事的思想傾向，認為該書編纂群體在東事問題上「一方面關注朝鮮安全，一方面警惕防範日本」，認識到了壬辰戰爭及海防經驗的重要意義。<sup>43</sup>

在水利方面，張軍以《皇明經世文編》中的水利文獻為分析視角，介紹了明正統至嘉靖年間政府治理黃河及保障南北漕運的舉措。在整理書中涉及黃河和運河的文章的基礎上，張氏首先敘述該時期「北堤南分」治河方法的確立和延續，並歸納相關河道管理措施和治河工程技術。<sup>44</sup>其次梳理明政府對呂梁洪、京師運河和會通河段的整治過程，以及一些大臣為保障漕運而提出的重啟海運方案、水源管理措施等。最後對明人治理黃河及保障漕運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認為「黃河下游主河道的選擇」及認清黃河多沙的特性，對控制黃河水患至關重要，「黃河多沙的特性也使得它不利於作為運河的引用水源。」<sup>45</sup>此外，有學者對水利與軍事方面的文章進行了綜合研究。例如，路其首結合《皇明經世文編》等明代文獻中的「西北水利議」和名臣奏議，論述明代「西北」一詞的含義和指示範圍。路氏指出，在明代相關文獻中，「西北」一詞「主要出現在水利和軍事上」。通過對其中「西北」的概念進行解讀，路氏揭示了明代「西北」一詞在水利和軍事上的差異性，並進一步探討其背後原因，提出「這種差異性的描述，應是基於明代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的錯位而形成的。」<sup>46</sup>

在糧政方面，魯鳳梅以糧食生產、徵收、運輸、分配四個環節為主線，對《皇明經世文編》中的相關文獻進行分類整理，同時參考《明史》及《明史食貨志校注》、《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等時人相關著作，論述了明代糧政的積貯、調配、漕運和保障體系，並以明末災荒的個案為例，說明建立效率良好糧政體系的重要性。<sup>47</sup>

40 虞萬里，〈《明經世文編》之編纂及其價值〉，頁 222。

41 徐向南，「《明經世文編》遼事類文章研究」（瀋陽：遼寧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16）。

42 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研究」（瀋陽：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史博士論文，2021）。

43 朱若翌，「晚明士人對壬辰戰爭以及日本的認識（1599-1644）」（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21）。

44 包括減水壩、栽柳護堤、鐵龍爪揚泥車等。

45 張軍，「明正統至嘉靖年間的黃河治理及南北漕運的保障——以《明經世文編》中的水利文獻為分析視角」（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13）。

46 路其首，〈明代「西北」的不同含義〉，《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6:3（2021）:153-160。

47 魯鳳梅，「《明經世文編》相關糧政問題研究」（南充：西華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16）。

在朝貢方面，吳智雄採用與傳統文獻整理法不同的數位人文研究法，探討了《皇明經世文編》所載明初海洋朝貢議論的特色。通過以「海」、「貢」、「安南」、「交址」、「朝鮮」等詞彙為關鍵字詞，對該書第1卷至第35卷所收錄文獻進行檢索分析，吳氏發現，「明初的海洋朝貢議論，具有專議安南入貢對治策略、頌揚海外來華朝貢盛況、通論海外藩國入貢事宜等三項特色」，且「引用若干經義以強化其論點，充分顯示了通經以致用的傳統治學精神。」<sup>48</sup>

在民生方面，常建華認為，在明代官員的奏疏中，「民生問題具有連接國家與社會的性質」。因此常氏以《皇明經世文編》有關民生的論述為中心，結合其他文獻，從國家與社會視角對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政治實踐加以解讀，由此闡釋了民生與民本、國計、吏治之間的相互關係，並進一步討論了「對明代士大夫進行多角度的探討」的必要性。<sup>49</sup>

除了上述有關明代時政的研究外，也有學者對《皇明經世文編》蘊含的其他史料價值進行深入挖掘。馬將偉從文學思想史角度，論述了以《皇明經世文編》為代表的晚明「經世文編」在明清文學思想遞嬗過程中起到的作用。通過闡釋《皇明經世文編》的選文標準，馬氏揭示了該書以文經世的文學觀趨向，在此基礎上，經由梳理分析「文以經世」思潮在明清之際的形成和發展，進一步說明晚明「經世文編」現象是文學思想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環，是明清文學思想轉向的轉捩點。<sup>50</sup>

## 2.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開創了晚清《經世文編》系列「以學術為綱領，以六政為框架」的編纂形式標誌著「經世文編」體的正式確立。<sup>51</sup> 晚近學者以該書為史料所進行

的專門史研究，或遵循綱目結構，從六政著手，或跳出原書體例，針對其他方面。

在刑政方面，周積明按照《皇朝經世文編》「刑政」綱下的「刑論」、「律例」、「治獄」三個類目，對該書83篇法律文獻的作者和內容進行了簡要介紹，在此基礎上，周氏從致用性、思想脈絡、選文作者及其職守意識等角度，解讀了《皇朝經世文編》中的法律文獻，發掘其在社會史、思想史中的價值，指出這些法律文獻對於「研究有清一代法律制度、法律專家以及法律歷史」的重要意義。<sup>52</sup> 在禮政方面，艾珊歌以《皇朝經世文編》「禮政」綱下「喪禮」目中收錄的文章為研究對象，論述了清代文人的喪葬觀。通過從尚禮、因時、務實、崇儉、不迷信陰陽等方面，對嘉慶朝及之前文人士大夫關於喪禮、喪俗的文章進行闡釋，艾氏為我們勾勒出與一般認識不同的清儒形象，即在喪葬思想上，清代士大夫「尚禮而不尚巫」，主張因時制宜，講求節儉務實，並非後世所批評之食古不化、封建迷信。<sup>53</sup>

在其他方面，仲亞東認為，「注意歷史上的普遍觀念及其主體人群、時代背景，分析具體時期生態思想與經濟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才能全面認識生態思想的演進歷程」，因此他以《皇朝經世文編》為視窗，考察了清朝前中期仕人的生態思想。結合書中的相關觀點，仲氏首先根據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同，對清朝前中期的生態思想進行了分區域論述，即「核心區側重於生態利用思想，而邊疆地區有更多生態保護的內容」。其次歸納總結了仕人們所提出的利用、改造自然環境的應對機制，認為其中反映了「增強公共管理能力的迫切願望」。最後通過闡釋「仕人們對宏觀生態系統的認識存在重要盲區」、「對可持續發展的探索仍不夠積極，天道觀中有著較重的不可知論的氣息」等問題，分析了清朝前中期生

48 吳智雄，〈由「數位人文研究法」探《皇明經世文編》所載明初的海洋朝貢議論〉，《南海學刊》2:1 (2016): 18-27。

49 常建華，〈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實踐——以《明經世文編》為中心〉，《古代文明》9:2 (2015): 82-114。

50 馬將偉，〈晚明「經世文編」的文學思想史意義〉，載於胡曉明編，《文章、文本與文心——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292-316。

51 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頁29。

52 周積明，〈《皇朝經世文編》「刑政」門中的法律文獻〉，頁341-374。

53 艾珊歌，〈從《皇朝經世文編》看清代文人的喪葬觀〉，《明清論叢》2017.1: 404-411。

態思想發展水準，指出當時的「生態保護仍處於自發階段」。<sup>54</sup> 焦雨楠則梳理經世文編中的水治演進，發現到治水在傳統上被囊括於工政，賀編、葛編、盛編均遵循此原則。但自清末新政以來，實際業務劇變間接影響經世文編編輯對治水的概念，「葛編在基本保留『六政』框架的基礎上增添『洋務』卷，而麥編、湯編則徹底打破『六政』框架，在現代『交通』概念下極力強調興修鐵路，其間兼及水運，這均是對時代變動極其生動的反映。」<sup>55</sup> 在新舊學制更易中，現代水利科學知識不斷被引進和日趨完善。

除了《皇朝經世文編》之外，少數學者對晚清其他經世文編的史料價值也有所挖掘。例如，金洪瓊以《皇朝經世文新編》為例，論述了晚清士人關於中外交涉的看法和見解。通過從交涉知識、交涉策略兩個方面梳理該書交涉門下的相關文章，金氏對書中涉及的中外交涉境況的認識、各國交涉歷史的追溯、具體交涉事件的分析、具體交涉如何開展等內容進行了介紹，並探討了這些思想言論在晚清的意義和價值。<sup>56</sup>

### 3. 晚清《經世文編》系列

晚清各部《經世文編》收錄了各時期切於時務的思想主張，構成了一系列「意見的光譜」。因此，從整體上審視晚清《經世文編》系列前後相承與相異之處，有助於「解讀晚清至民初經世思潮的傳承與變遷，從而揭示經世傳統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中演遷的軌跡。」<sup>57</sup> 近

年來，有關晚清《經世文編》系列的整體性研究主要側重於兩個方面，一為傳統思想文化的調適，二為近代西方知識的接引。

#### (1) 傳統思想文化的調適

晚清以來，面對內憂外患，以經世致用為核心的經世思潮漸次在全國興起。作為經世之學的載體，晚清《經世文編》系列直觀反映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為解決現實問題所進行的自我調適。

在晚清思想研究方面，鐘月將晚清十部《經世文編》作為考察對象，<sup>58</sup> 以吏政綱中的文章作為主要資料來源，從整頓吏治、居官要求、選官原則三個方面，闡述了晚清時期的吏治思想及發展脈絡。在此基礎上，鐘氏認為，《經世文編》中的吏治思想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沒有突破封建主義的藩籬」，但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加上個人的實踐與創新，其中出現了一些開明的主張，「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的社會矛盾，穩定了社會秩序，在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up>59</sup> 同樣，師桂雪通過解讀《經世文編》系列中的教育文獻，對晚清民初的教育問題進行探討。在梳理十三部《經世文編》尤其是禮政綱中相關文章的基礎上，<sup>60</sup> 師氏首先簡要介紹《經世文編》中教育文獻的概況，指出這些文章主要涉及科舉制問題、學校問題、新教育問題、祀典問題及西方教育問題等。其次以書中相關文獻為視角，闡述了前三個教育問題的具體內容，包括科舉制存在的問題和改革建

54 仲亞東，〈清朝前中期仕人的生態思想——以《清經世文編》為中心〉，《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科版）》11:3（2012）:1-7。

55 焦雨楠，〈繼承與蛻變：從經世文編看水治演進〉，《河北學刊》42:4（2022）:98。

56 金洪瓊，〈晚清經世致用之學的「交涉」初探——以《皇朝經世文新編》為例〉，《文教資料》18（2021）:73-75。

57 沈豔，〈近代「經世文編」賡續潮流述論〉，《史學月刊》2004.3:108-115。

58 即賀長齡、魏源所輯《皇朝經世文編》，饒玉成、葛士浚、盛康分別編輯的三部《皇朝經世文續編》，陳忠倚所輯《皇朝經世文三編》，麥仲華所輯《皇朝經世文新編》，邵之棠所輯《皇朝經世文統編》，何良棟所輯《皇朝經世文四編》，甘韓所輯《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求是齋所輯《皇朝經世文編五集》。

59 鐘月，「晚清『經世文編』中的吏治思想」（貴陽：貴州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17）。

60 十三部《經世文編》：即賀長齡、魏源所輯《皇朝經世文編》，葛士浚、盛康分別編輯的兩部《皇朝經世文續編》，陳忠倚所輯《皇朝經世文三編》，麥仲華所輯《皇朝經世文新編》，金匱闕鑄補齋所輯《皇朝新政文編》，宜今室主人所輯《皇朝經濟文新編》，邵之棠所輯《皇朝經世文統編》，何良棟所輯《皇朝經世文四編》，求是齋所輯《皇朝經世文編五集》，甘韓所輯《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于寶軒所輯《皇朝蓄艾文編》，經世文社編譯部所輯《民國經世文編》。師桂雪指出，「在禮政目下，文編的編纂者們對教育問題給予了很多關注，收錄了多篇文章」。

議，推廣學校的原因、主張、認識及輔助措施，《民國經世文編》中關於新教育的方針和認識等。最後了討論這些教育問題的收錄原因、社會影響及借鑒意義，揭示了經世文編中的教育問題「深受社會變革的影響」、「與國外新教育趨勢息息相關」的變化趨勢。<sup>61</sup>王先明進一步指出經世文編由初編踵起接續，實則是標示了文化演進的趨勢，然而民國乃至於五四運動後的思想與文化選擇為之一變，開始從尋求西法以自強到訴諸於文化以自省，藉由《民國經世文編》的內容可窺見變化根源。<sup>62</sup>

在晚清文化研究方面，王志華以清代世風與文風的變化為背景，探討了以曾國藩為中心的湘軍奏議在晚清的傳播及影響。在研究傳播情況的過程中，王氏認為，「除卻官方記載，湘軍奏議最主要的傳播方式乃是通過各種經世文選本進入大眾視野」。通過選取湘軍集團在政治上最活躍時期的四部經世文編，<sup>63</sup>並從類目安置、選文數量、側重作者等方面，對其中收錄的湘軍奏議進行了分析和對比，王氏揭示了「湘軍奏議在晚清的傳播與接受程度已經十分廣泛。」<sup>64</sup>

## (2) 近代西方知識的接引

中國近代學科體系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逐漸建立起來的，在此過程中，西方知識如何被人們所接引？關於這個問題，過去大多從少數精英層面進行考察。作為反映普通士人一般認知狀況的史料，近來晚清《經世文編》系列的相關研究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例如，章清曾對晚清《經世文編》系列的相關史料價值有所評述。在簡要介紹晚清十三部《經世文編》編輯出版歷史的基礎上，章氏指出，「單從各『文編』的類目看，即可發現西學知識不斷遞升的過程，不同版本的『經世文編』也構成『呈現』西方知識如何被接納的基本資源。」<sup>65</sup>同樣，管世琳認為，晚清《經世文編》系列的「編目分類及選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士人對此類事務的認知，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為了探討晚清士人對西方外交概念的接受過程，管氏梳理了晚清十部《經世文編》中涉及外交部分的編目分類與收錄內容的變化，<sup>66</sup>從而闡明了其編目取向從既有體制到突破傳統的流變規律，<sup>67</sup>在此基礎上，結合分析本土知識對認知「駐外公使」這一具體概念所產生的影響，管氏指出「晚清士人對西方外交概念的認知與受容，大抵就是經歷了這樣一個從求諸本土知識的歷史類比，到借鑒國外經驗進而接納西學知識的轉變。」<sup>68</sup>朱昱坤則從晚清《經世文編》的學術綱目變化研究接引西方自然科學的分類特點。朱氏認為，晚清士人大量以「算學」為突脫口吸納西學，從「實用」引出「學理」的傾向鮮明，最後從注重「通專之辯」到逐步接受西方分科之學，皆呈現晚清士人認識和接引西學的主動性，而非被動接受西學。<sup>69</sup>

王先明和李尹蒂以晚清民初的《經世文編》系列為中心，對近代農學在中國的發生與發展進行考察。在梳理十四部《經世文編》農事內容，<sup>70</sup>尤其是戶政綱中相

61 師桂雪，「晚清民初的教育問題——以『經世文編』為視角」（南充：西華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16）。

62 王先明，〈從自強到自省：近代中國歷史的文化取向——聚焦於經世文編演進脈絡的一個思考〉，《廣東社會科學》2023.5: 145-146。

63 即饒玉成、葛士浚、盛康分別編輯的三部《皇朝經世文續編》以及王延熙、王樹敏所輯《皇朝道咸同光奏議》。

64 王志華，〈經世與辭達——以曾國藩為中心的湘軍奏議研究〉，《北京社會科學》2017.10: 96-105。

65 章清，〈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 306-317。

66 即賀長齡、魏源所輯《皇朝經世文編》，葛士浚、盛康分別編輯的兩部《皇朝經世文續編》，陳忠倚所輯《皇朝經世文三編》，三畫堂主人所輯《皇朝時務經世文編》，麥仲華所輯《皇朝經世文新編》，求自強齋主人所輯《皇朝經濟文編》，邵之棠所輯《皇朝經世文統編》，何良棟所輯《皇朝經世文四編》，寶善齋主人所輯《最新經世文編》。

67 管世琳指出，賀氏《皇朝經世文編》中涉及「外交」的文章主要在「兵政」類「海防」目下，陳忠倚、自強齋主人、何良棟儘量將對外交涉納入「禮政」類。

68 管世琳，〈本土知識與晚清士人對西方外交概念的受容〉，《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科版）》44: 4（2017）: 129-134。

69 朱昱坤、聶瓊玲，〈晚清『經世文編』的知識分類：一種理解西方科學的方式〉，《浙江學報》2023.6: 220-227。

70 即魏源、賀長齡所輯《皇朝經世文編》，饒玉成、葛士浚、盛康分別編輯的三部《皇朝經世文續編》，陳忠倚所輯《皇朝經世文三

關論述的基礎上，<sup>71</sup>王氏和李氏首先從綱目、作者、內容等方面分析書中農事文本的變化，闡明《皇朝經世文三編》及《皇朝經世文新編》「為經世文編農事文本選擇的轉捩點」。其次從西方傳教士的引介以及甲午戰敗的影響等角度，介紹了西方「農學」知識傳入的內在動因。最後論述中國近代農學的內涵，並探討從「傳統農政」到「近代農學」的時代意義，認為其「彰顯兩千年來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的架構已到了最後的自立階段，至19世紀中葉起向『經世之學』轉變，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了『分科之學』的知識建構。」<sup>72</sup>郭盛則考察電學的發展，得出晚清士人具有「電學西來」說和「電學中源」說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前者沿襲了漢譯西學著作中的敘述，後者則是受清末諸子學影響下，由中國學者依據 electricity 的中文譯名「電氣」的構詞理據中考據得出。<sup>73</sup>

### (三) 文編與其他出版物

早期學者討論過《經世文編》與策問資料、西學彙編、百科全書之間的關係。晚近學者在此基礎上，對《經世文編》與西學彙編、百科全書的相似之處略有論述，三者皆在晚清時期對西學的傳播發揮重要作用。其中，西學彙編出現較早，明末清初，中國士人已嘗試以傳統類書的形式彙集西學著述，<sup>74</sup>及至晚清，在「採西

學」的需求下，這種出版物開始大量湧現。李沛廉認為《經世文編》與西學彙編在分類西學知識上呈現相近的問題。通過分析葛士浚編纂的《皇朝經世文續編》、陳忠倚編纂的《皇朝經世文三編》以及同時期出版的西學彙編資料在類目編纂上的安排，<sup>75</sup>李氏發現晚清士人「在整理西學譯書時，傾向沿用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去分類西學知識」，此舉在有利於西學傳播的同時，造成「知識歸類錯誤、學術混淆不清」。<sup>76</sup>此外，章清在文章中指出，後出的《經世文編》逐漸增添了西學的內容，「其類目與其他以『西學』、『新學』為名的彙編資料的類目漸漸趨同。」<sup>77</sup>

為了研究百科全書興起的意義，早期學者比較了其與《經世文編》在編輯、內容、思想上的差別。<sup>78</sup>晚近學者進一步討論了兩者的相似性。例如，李孝悌指出，甲午戰爭前後出版的各部《經世文編》，「在內容上呈現少數、個別和百科全書類似的風格」。他認為，葛士浚所編《皇朝經世文續編》洋務綱中的一些條目，「約略有了百科全書的味道」；甘韓所編《皇朝經世文新增時務洋務續編》中的洋務卷，在內容和呈現方式上與百科全書頗為類似，其後甘氏所編《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可以說是傳統經世文編和百科全書的混雜綜合版」。<sup>79</sup>

編》，何良棟所輯《皇朝經世文四編》，求是齋所輯《皇朝經世文編五集》，麥仲華所輯《皇朝經世文新編》，甘韓所輯《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邵之棠所輯《皇朝經世文統編》，求自強齋主人所輯《皇朝經濟文編》，宜今室主人所輯《皇朝經濟文新編》，于寶軒所輯《皇朝蓄艾文編》及經世文社編譯部所輯《民國經世文編》。

71 王先明和李尹蒂指出，「關於農事的文本多收錄於『經世文編』『戶政』類『農政』門中」，而《皇朝經世文三編》大部分收錄於「戶政」類「屯墾」、「養民」門中，《皇朝經世文四編》大部分收錄於「戶政」類「農功」門中，《皇朝經世文編五集》打破六政框架，「代以具體的『農政』類述之」。

72 王先明、李尹蒂，〈從「農政」到「農學」——以晚清「經世文編」為中心的歷史考察〉，《福建論壇（人社科版）》2012.6: 81-114。

73 郭盛、聶馥玲，〈西學中源〉之下的中國「電學史」溯源——以晚清經世文編為中心〉，《文化學刊》2022.12: 223-2226。

74 章清，〈晚清西學「彙編」與本土回應〉，《復旦學報（社科版）》2009.6: 48-57。

75 即盧梯青、王西清合編的《西學大成》、孫家鼐主編的《續西學大成》。

76 李沛廉，〈晚清西學知識建構問題——以《皇朝經世文編》《西學大成》系列為中心〉，《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2021.1: 34-39, 61。

77 章清，《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頁317。

78 韓承樞，〈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頁228。

79 李孝悌，〈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東吳學術》2012.2: 45-55。

整體而言，近十年來有關文化現象的研究，在論文數量上遠超早期學者，且關注課題集中於專門史方向。<sup>80</sup> 早期研究應用經世文編史料的為數不少，但大多只是稍加引用。近年來眾多專門史研究將《經世文編》作為基礎史料，或以經世文編為題，這種現象說明《經世文編》正逐漸成為大陸學界研究的焦點。在研究物件上，儘管早期學者對整體把握這股文化現象的研究意義有所闡釋，<sup>81</sup> 晚近學者有關《經世文編》的專門史研究，依舊以單一文本為主。<sup>82</sup> 由此可見，如何充分利用《經世文編》系列這座巨型資料庫，並對其中相關資源進行有效整合，目前仍是專門史研究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 四、結 論

以上是近十年來《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從相關學術成果來看，某些方面仍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關於編纂問題的研究，筆者有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在研究物件方面，晚近研究主要針對《皇明經世文編》和《皇朝經世文編》，對《經世文編》中的其他各部尚需從編纂背景、編纂群體、編纂體例、選文原則、文獻編輯等角度進行全面研究，進而才能從整體、長時間的高度把握《經世文編》系列的編纂規律。

其次，在編纂體例方面，近年來許多研究側重於分析體例變化和介紹綱目內容，對其背後的編纂思想尚需追根溯源。例如，葛士浚所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將「算學」三卷列於「文學」目下，有學者認為這種現象反映

了新知的安置在當時構成問題，故「且將新酒入舊瓶」。然而傳統「文學」囊括「經史子集」，有「文章博學」之意，<sup>83</sup> 且 1897 出版的《萬國分類時務大成》也將「各國算學」列於「文學類」下，<sup>84</sup> 編者錢頤仙在「凡例」中對此有專門說明。<sup>85</sup> 據此，筆者認為，從傳統編纂思想角度出發，這種類目編排是題中應有之義，或在葛士浚所輯《皇朝經世文續編》（1888 年）之前就已有成例。由此可見，相關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

復次，在文章選輯方面，《經世文編》系列中存在大量重複收錄文章，筆者認為這種現象值得關注。一方面，《經世文編》的編者在材料的取捨上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同一篇文章在各部《經世文編》中的不同之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編者意識；另一方面，《經世文編》考慮了普通士人的閱讀心態，某類文章重複收錄的次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的社會弊病或知識分子對某種問題的關注程度。

最後，在編纂群體方面，近來研究側重於分析單一文本的編者分工及構成，鮮有文章從社會學角度對各部《經世文編》的編者進行集中討論。李孝悌對 1890、1900 年代上海出版的百科全書及其作者進行了概括性分析。<sup>86</sup> 受其結論啟發，<sup>87</sup> 筆者認為，對於同樣於 1900 年後在上海迎來出版高潮的《經世文編》系列，其編者之間應該也存在著某種相互聯繫或共同之處。

關於文化現象的研究，筆者對其中的史料價值研究有以下幾點建議：

80 韓承樺在《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中列舉有關文化現象的論文 12 篇，其中專門史方向僅有 1 篇，筆者所見近十年來有關文化現象的論文 23 篇，其中專門史方向 17 篇。

81 韓承樺，〈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頁 220-226。

82 筆者所見專門史研究中有 12 篇論文以單一文本為史料，5 篇論文以晚清《經世文編》系列為史料。

83 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 306。

84 錢頤仙，《萬國分類時務大成》（上海：袖海山房，1897），頁 1。

85 錢頤仙解釋道：「即文學兩字，亦不過第就泰西各國語言文字所見諸紙筆者而言，故光學等類統以算學，均分隸諸文學之末。」

86 李孝悌，〈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東吳學術》2012.2: 45-55。李孝悌，〈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續）〉，《東吳學術》2012.3: 46-57。

87 李孝悌指出，「來自同一區域的百科全書家，或是彼此相識，或是從事類似的文化事業，往往互相援引，在家鄉或上海結成網路」，且「絕大多數被摒棄於傳統的科舉仕進之途之外，在通過秀才這一個基本關口後，就被迫轉向時務和西學所提供的另一條看起來也充滿了可能性的晉身之階。」

首先，在研究對象方面，近來單一文本的研究以《皇明經世文編》和《皇朝經世文編》為主，晚清《經世文編》系列的研究也只選取了部分文本，<sup>88</sup>筆者認為，各部《經世文編》中的相關文章皆有助於我們從事專門史研究，只有擴大研究物件，涵蓋更多乃至所有晚清時期的《經世文編》，才能全面梳理和把握晚清社會的演變過程及規律，不致有所缺失。

其次，在研究範圍方面，近來研究較為偏重時政，尤其是涉及清代《經世文編》的專門史研究以六政相關事務為主。近代科學在中國是通過西方科學的移植建立起來的，晚清《經世文編》系列的綱目沿革，部分綱目下有關數學、天文、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的文章，皆為研究西方科學的接受和引入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遺憾的是，除了農學之外，近來尚無文章對此方向進行專門性研究。

此外，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也觸及到某些歷史學和科技史前沿問題：

首先，晚清《經世文編》系列的選文作者除了高官大儒之外，更多是普通知識分子，這為我們研究清季士

大夫階層的思想變遷，提供了較為全面的參考資料。通過分析和闡釋《經世文編》中上層官僚及下層仕紳的思想主張，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從上到下窺視西學在士大夫階層中的傳播與接受過程。

其次，作為「家置一編」的清末暢銷書，晚清《經世文編》系列收錄的西學知識及相關評述，有助於我們追溯近代科學知識在中國興起的源頭。若能將書中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晚清社會變遷進行整體性關照，或可從科學社會史角度闡述近代中國科學的發生與發展。

復次，相較百科全書、西學彙編等同時期專門介紹西學的書籍而言，《經世文編》在傳統經世觀念的影響下，思想保守，反應遲鈍，然而正是這種滯後性，恰能反映中西兩種文化相遇時的衝突與調適，因此《經世文編》系列對於研究範式轉移在近代中國是否適用，以及知識涵化等問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最後，《皇朝經世文編》直面中西學在清朝的碰撞和交融，並連帶記錄時人對於中國落後原因的探討。在此基礎下，或對學界從技術傳統角度理解李約瑟難題，有些許啟示和助益。<sup>89</sup>

88 來新夏所著《清代經世文全編》中，收錄《經世文編》22種，而近來研究只涉及其中的十幾種。

89 1964年，李約瑟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中提出「為什麼近代科學只在歐洲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產生？」這就是所謂的「李約瑟問題」。見：張劍，〈「李約瑟問題」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解說〉，《科學》66: 2 (2014): 6。